

芬芳的记忆

——我认识的安妮·埃尔诺 □山 飒

随着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我听到了一个熟悉而遥远的名字,脑海中浮现出一张亲切的面孔,一连串温和细腻的声音。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1999年9月我的第二本法语小说《柳的四生》在巴黎出版发行;2001年9月,我的第三本小说《围棋少女》在巴黎出版,在此之前,我遇到了安妮。

2000年3月安妮出版了《事件》。这本小说借用了她在1963年至1964年写的日记,用新闻报道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23岁那年怀孕的事件。当时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堕胎是被法律禁止的,直到1975年,堕胎在法国才合法化。

这年秋天,21世纪刚刚过了一年,巴黎城中,荷兰栗子树金黄的落叶一片片地在空中旋转,飘落在潮湿的地面,空气洋溢着咖啡、法棍、巧克力,还有松木的香气。出版社专门负责外省事务的女士,在电话里对我说,一年一度外省签书活动又开始了。每个出版社都有珍爱的作者,紧紧地用预付稿费和预签出版合同拴着我们。作家们被称为出版社的小马。因为我们会为出版商参加销售竞赛。

波尔多,马赛,南希,图鲁斯,圣马洛,多维尔,都是历史名城,不过我更对名单上的小城感兴趣。深知如果没有书展,也许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参观这些小城,比如马延、南特、布里夫拉盖亚尔德。公关帮我安排好的日程,又发来详细的名单,出发这天,她打了出租车来接我,手里拿着我的火车票。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需要想,被她一阵风似地卷走了。上了火车,公关举着票,一路摸去,进了头等车厢,一进门,就像走进了文学史的长廊,里面人影绰绰,晨雾蒙蒙,充满咖啡和红茶的气息,仔细看去,作家、学者、历史学家、记者,主持人,出版人,个个都是挂在文学馆墙壁上的肖像,电视屏幕上出现遥远而熟悉的面庞。有人在寒暄聊天,有人在阅读报纸。有几个公关助理在焦急地打电话:有人走错了车厢,有人迟到,还有人坐错了火车,已经出发了。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公关热情地来接我。不迷糊不成作家,她怕我找不到火车站。

公关悄悄地对我说:“看到那位作家了没?他去北部城市参加售书的时候,由老婆陪同,去南部的时候,由情人陪同,你以后不要弄错,两位夫人长得很像。”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男士,身边站着一名同样高大的女性,男士正在与一位编辑高谈阔论。

原来外省售书还有很多心照不宣的秘密!

车厢深处,金黄头发的安妮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人轻声聊天。

在华语地区,文学受到网络文化冲击,地位日益下降,而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学依然霸占着文明的舞台。文学,在美国,是国家和读者推崇的文学,文学家,尤其是社会的精英。在法国外省,一年一度的书展、图书节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节日,得到省政府、市政府的经济援助。作家们的来往车票、吃住,书展志愿者的吃饭,以及专门为书展搭起的帐篷,都是地方政府机构出钱。

火车一到站,就有志愿者在站台上等候,微笑着帮我们拎行李;出了火车站,上了大巴车,我们就直接被拉到书展上,按照作家们的话说,“开始干活”。书展都是周末举办,作家们所

出售的作品由当地参展的书店提供,在某些小地方是“网红打卡”的必经之地。整个地区的人,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都会前来看书买书。书展上人头攒动,还会展示当地丰富的农产品,安置开放式酒庄;如果在北方,就会提供奶酪、咸肉、红葡萄酒、特色巧克力和饼干;如果是南方,会多出葡萄酒、火腿、蛋糕、松茸、鹅肝、生蚝。

作家按照名字打头的第一个字母排序,各就各位,书店的老板们热情地送上一杯杯红酒,空了再续。无论是早晨还是下午,法国作家们绝不拒绝,直接开喝。安妮的字母开头是E,我的字母是S,我们之间相距13个字母,因此她坐在离我较远的位置。虽然我于1999年出版处女作后,参加过几次书展,但是因为与她距离甚远,和她从来没有交往。

法国的文坛也分三六九等,按资排位。离我较近的作家都是当年的明星。

法国的文化中心是巴黎,巴黎的精英作家往往也是巴黎上层社会的精英。

我的邻居,Gonzague Saint Bris,他是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小说家,一头乱发,不修边幅,说话时带着贵族的矜持;他母亲的家族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出版商。他出生长在城堡里,这座城堡原是法国国王弗拉基米瓦送给达芬奇的府邸。五百年前,达芬奇在里面生活创作。Jean-Marie Rouart,既是作家,也是费加罗杂志的专栏记者,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祖辈出过多位印象派大师。他热情多话,总是偷偷抱怨说,来找他签名售书,缠着他聊天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他很羡慕我书桌前排队的年轻人。曾经任费加罗杂志主编的Jean d'Ormesson已经是文学泰斗,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法国作家。虽然个头不高,他有一对深邃的蓝眼睛,似乎总想从对方身上挖掘什么阴暗之处,嘴角上总是挂着亲切而略带讽刺的微笑。如果不是作家,他头衔是伯爵,父亲和母亲各给他遗留了一座城堡。他一出现,还没有坐下,就被热情的读者簇拥起来。

除了这些古老的文化世家、文坛霸主,还有以销量说话的青壮派,他们的桌前都排起了长长的粉丝队伍。

这天下午,我的桌前空下来。人来人往的过客直奔周边几位当红的作家桌前排队,没有人在我的桌前驻足,更没有人瞥一眼我的作品。面对空旷的大厅,我觉得特别尴尬。远远地,我看到了50米开外斜对面的安妮。我能看到她,正因为她的桌前也没人,桌面上放了一杯红酒。然而,在她的字母行列里,有美丽的女作家Dominique Bona,她的父亲是著名政治家,还有英姿不减当年的Florence Delay,父亲是著名学者,20岁的时候主演了成为电影经典的《圣女贞德》。

安妮目视前方,十分淡定。安妮在20世纪70年代踏入出版界,一直住在巴黎郊区。她出版的小说不算多,但有自己的

读者群。她不是记者,没有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更没有销量上百万的业绩,她的生活依靠工资而不是微薄的稿费。

在这个Who is Who,谁是谁家的孩子的文坛上,安妮却挺直腰板,大胆地诉说自己的故事:父亲出身农民,成了工人,参了军,退役后在小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从20世纪70年代起,安妮就在几部自传体的小说中炮轰这位以文化为耻辱的父亲,用文字清算那个世俗压抑的小镇。

2000年,还没有智能手机这种高科技。桌前没有人排队签书是无法排解的无聊。我看了看她,不清楚她是否也看了我,然后继续抿上两口矿泉水,玩玩手上的笔,把长发编成辫子。

在我正不知干什么好的时候,桌前来了一个人,正是安妮·埃尔诺!

她翻了翻我的书,告诉我去年她应邀去了中国,特别喜欢蜿蜒在工地之间的北京小胡同。她的声音柔和细腻,迫切地给我讲述她在中国的见闻,似乎通过诉说,她好像再一次回到了中国的土地。最后她买了我的书,让我签名,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解了我的围,我心中十分感激,我那时还不了解她的作品呢。过了一会,我看她的桌前继续没人,我也起身走过去,买了她的两本书,请她签了名。

那年,我20多岁,而安妮已经60岁了。其实她的身材很好,一点不显老,在我20岁的眼睛里,她也就是40多岁。她的穿着打扮很随意,脸色特别苍白,从不佩戴明晃晃的珠宝,随意地披着金黄色的头发,似乎总也没有梳头。尽管如此,安妮的举手投足都显现出法国知识女性特有的风韵。她的蓝眼睛,占了上半脸的大部分,里面射出的光,既有女人的温柔也有知识分子的坚定,还有几分少女的天真。安妮最大的特征就是淡定。

外省签书活动断断续续持续到第二年春天,而巴黎市政府组织的巴黎图书节为法国现代文化画上最辉煌的感叹号。巴黎市政府是法国政坛的孤岛、堡垒,是插在执政党心脏的楔子。巴黎市政府永远要和政府唱反调。巴黎市政组织的图书节显示了行政机构的威力和威风。图书节选择的日期是圣诞节前的一天,这是全国图书销量的高峰期,因为法国人有互送书籍作为圣诞礼物的传统。巴黎图书节干脆在金碧辉煌、壮丽无比的巴黎市政厅的大厅举办。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围棋少女》爬上了法国的畅销书榜,并获得了青少年龚古尔文学奖。我步入了“青壮派”的行列,桌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再也没有时间走动聊天。

Gonzague Saint Bris打断我和读者的交流,邀请我参加他在自己家乡举办的小书展,说夏天到来的时候,他的城堡前,栗子树荫里摆起长桌,作者们喝着小酒和读者见面。我看他特别希望我参加,就一口答应。没想我就此暂离文学圈子,



安妮·埃尔诺

走进了专注体验画家的旅程,在世界各地参加画展和艺术节,错过了几次栗子树图书节。我迷上了普鲁塞尔、伦敦、迪拜、阿布扎比、纽约、迈阿密,东京的城市猎奇。再后来,传来噩耗,Gonzague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在我心中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内疚。

安妮也来了。依然坐在按照名字打头字母安排的座位上,也就是比较靠前的位置,那个位置有冷风,容易感冒。她的面前,没有多少人,她依然很淡然。没有人知道20年后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国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女性作家。

安妮的写作不是为了取悦读者;她的写作是让读者不愉悦。她用干涩简单粗暴的词汇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父母、童年的社会、传统家庭、传统价值观。虽然是一名女性,她却是勇敢的战士,希望“文字能像石头一样,让它们拥有现实的力量”。

Pierre-Jean Remy去世了。还记得他在上手术台前,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即将出版的小说,一部科幻小说! Maurice Druon去世了。记得他和夫人邀请我去波尔多他的葡萄庄园小住,80多岁的他兴奋地给自己心爱的小毛驴套上车,邀请我坐着驴车在他的葡萄园里兜圈,还能听到他吆喝:“驾!快跑!卡罗琳娜!”Jean d'Ormesson 去世了。永远忘不了他自信和智慧的目光。Paul Lombard 去世了,至此法国的司法厅中少了最洪亮精彩的辩论声。

安妮已经82岁,听说她患上了癌症,却依然在战斗。去年,她的作品《事件》被搬上电影屏幕,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今年她和儿子一起制作了纪录片《超8岁月》。从非法堕胎到参加反政府游行,从落魄贫穷的女学生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不在乎销量、读者、媒体、文坛、政坛,她追求真实公正,虽然身为孱弱的女作家,依然是敢于给社会动脉放血的突围者。

■书讯

近期,第100届龚古尔奖获奖小说《布莱希特的情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中文版。

该书作者雅克-皮埃尔·阿梅特(Jacques-Pierre Amette)是法国当代杰出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曾在《纽约时报》和多家法国媒体担任记者,著有《两只豹子》《沉默的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部戏剧作品。他对德语文学和电影充满热情,在大学时喜爱托马斯·曼和荷尔德林。他搜集大量布莱希特的资料,在小说《外省》里已有体现,《布莱希特的情人》则更是为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而写的故事。

布莱希特是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史诗剧”的创立者,20世纪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在黑暗的时代”仍然书写“关于黑暗时代的歌”的诗人。他在1933年因反对纳粹而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1948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柏林。《布莱希特的情人》就是从此时写起,用大量史料支撑,详尽描绘了这位大师的人生最后八年时光。小说中的布莱希特,对德国怀着深沉的感情,他希望用自己的戏剧创作来挽救这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衰朽的精神。

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历史人物,玛丽亚·艾希。她是一位女演员,也是东德雇佣的一名间谍。她走进布莱希特的生活,成为了他的情人,事实上却在执行监视他的任务。玛丽亚在执行任务初期,怀着一颗“炙热而纯洁的心”,她对自己的工作有使命感,有近乎荒谬的信念。但在她观察布莱希特,与这位戏剧天才、思想巨人相处的过程中,这种信念慢慢动摇。她一遍遍审视着布莱希特,审视着自己,也审视着两人之间的“爱情”。

布莱希特的形象也在这种特殊视角的凝视中丰满起来,他不只是对祖国心怀忧虑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有着普通欲望的衰老男人。在知道玛丽亚的身份之后,布莱希特并没有立刻断绝两人的关系,这其中的感情复杂而微妙。

玛丽亚的形象虽是虚构,却也是多面的。她对另一名间谍有着真实的爱,但这份爱却因为他们特殊的工作而必然失败。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失败中:布莱希特拯救德国精神的理想在东德庞大而腐朽的体制下无法落地生根,他与玛丽亚之间只有误解与不信任,玛丽亚与她的爱人之间也只有带着“原罪”的爱情。然而,失败本身又如此迷人,越是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在注定的命运面前,人们愈要抗争,愈要用生命的时光挑战这份命运。(思 思)



法国摄影师维利·罗尼作品《小巴黎人》

《布莱希特的情人》出版

《沉默的钢钉》:全球视角下的美国铁路华工史

□王 凯

美国华裔学者张少书(Gordon H. Chang)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奥利弗·H.帕尔默人文学科教授,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99年凭借出众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学术潜力荣膺古根海姆学者奖。张少书的研究兴趣广泛,在美国的种族和族裔问题、美国的对外关系、华人离散史、美国亚裔历史、中美关系、全球史等领域颇有建树。作为第四代华裔美国人,美国亚裔及华裔议题是他观照的重要议题之一,其代表作包括《亚裔美国人与政治:视角、经验与展望》(2002)、《美国亚裔艺术史:1850-1970》(2008)等。2012年,随着“北美铁路华工项目”(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Project)在斯坦福大学的开启,作为项目组织者之一的张少书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在美华人历史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与费雪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合著的《华人与铁路: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2019)以及他所撰写的专著《沉默的钢钉:铸就美国铁路奇迹的中国劳工》(2019,以下简称《沉默的钢钉》)堪称是美国铁路华工史研究领域两部里程碑式的力作。

1969年5月10日,摄影师安德鲁·J.拉塞尔(Andrew J. Russell)拍摄的一张照片定格下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并被历史所铭记。代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两辆蒸汽机车在普罗蒙特里峰成功合龙,标志着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胜利竣工。然而,作为记录历史时刻的照片,它永远铭刻下了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开启了美国历史的新篇章,但另一方面,照片的边框,作为一种边界的象征,却又发挥着排外的功能,把20000余名铁路华工在修建这条铁路时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功勋抹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他们的缺席意味着否定了他们在修筑跨越美洲大陆铁路线时发挥的关键作用,至少低估了他们的作用。”进而,东西相向的合龙、东西双方的握手,似乎仅仅体现出美国东西海岸在时间上的一次飞跃式拉近(该铁路的建成将美国东岸到西岸的时间从长达数月缩短到仅需六天),而把全球层面上的东西方沟通以及中美两国的深度交往弃之一旁,矮化了这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所具有的全球性意义。

《沉默的钢钉》是一部从跨国角度、全球视野论述铁路华工史的著作,从美国铁路华工的来源地广东四邑地区(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说起,分十章详述了受雇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20000余名铁路华工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凭借无穷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历时数十年之久修筑横贯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感人历史。为全面再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研究者除英文文献外,还搜集了中美两国有关铁路华工的中文资料,为

进一步探寻铁路华工的生活经历及背景提供了帮助,此举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该铁路的研究专著中尚属首次。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美国史研究、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文化学的角度整理分析了以中英文为主的各国文字记录的文献档案、商业文件、考古报告、官方记录以及家庭收藏品、纪念品、案卷,同时结合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对铁路华工的后代进行了采访,以期了解他们祖辈的故事以及整个家族对他们的记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铁路华工没有记录自己的经历,他们就职的铁路公司又对他们的生活起居漠不关心。研究者无从掌握相关细节问题的真实情况。他们只能在考古学的帮助下把过去的各种材料进行创造性的拼接,尽力恢复这段历史的部分内容。但即便如此,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试图讲述修筑太平洋铁路的铁路华工史全貌的著作,该书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依然是功不可没的,“张少书通篇运用他深厚的学识和同理心努力弥补第一手记录缺失所带来的挫败感,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除为种族主义阴影下的铁路华工发声、肯定他们为横贯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总体目标外,《沉默的钢钉》这部学术专著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重塑了美国华人的形象,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华人男性沉默、温驯的刻板印象;第二,该书对美国铁路华工史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在东西方交流的语境下对横贯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梳理和观照。

在19世纪,美国,铁路华工往往被视为是一群“边缘人物,充其量只是一群逆来顺受、默默无闻的劳动力,毫无个性和话语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温顺。面对与白人平等的薪资和工作时长,1867年6月24日,3000名铁路华工在周密的组织下,集体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举行集体罢工。在此期间,铁路华工,尤其是罢工的领导者,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战斗精神和对平等的强烈要求。据《上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报道,铁路华工举行罢工的目的是为了达到40美元月薪和一天8小时工作制的诉求。尽管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次罢工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铁路华工,尤其是那些富有经验、技术娴熟的铁路华工的确通过罢工实现了薪资的提升;另一方面,“罢工是他们表达自身诉求的一个重要方式,事关自尊和‘面子’,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远不如反抗本身重要”。这次罢工在全体铁路华工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具有反抗精神的华工经常用罢工来作为反抗不平等的工具和武器,并为他们赢得了些许的尊重。太平洋铁路成功贯通后,铁路华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E.B.克罗克(E. B. Crocker)在萨克拉门托举办

的庆典上对铁路华工的卓越表现予以了特别的感谢:“我希望提醒你们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这条铁路的初期建设,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贫穷、受人轻视的华工,他们的勤勉和尽职尽责确保了这条铁路的竣工。”一时间,用来描述中国人的性别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的华人现在成了“这个国家有活力的、富有阳刚气概的新成员”和“具有阳刚之气的杰出移民”。就随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也宣称:“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中国人,中国人也像‘男人’一样回报公司……中国人是‘男人,是好男人、真正的男人’。”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明确呼吁关注铁路华工为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所作的贡献,因为“这条铁路为中美两国建立早期联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当修建一条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这项宏伟计划被首次提出时,中国就被纳入了这幅宏伟蓝图之中。譬如,该计划最积极的早期倡导者阿萨·惠特尼(Asa Whitney)当时就坚信:“美国的未来在于加强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就有记者在盛赞华工的坚韧和辛劳的同时,看到了这条铁路所具有的全球意义,“铁路华工扫除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开辟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伟大的铁路,促进了全球商业和文明的发展”。太平洋铁路正式竣工后,美国人开启了对自己国家版图的新思考,太平洋铁路不仅使刚刚经历过内战的美国重新团结起来,而且也扩展了美国人认识美国的传统视角。除南北视角外,他们也开始从东西方向来审视美国以及美国的战略发展走向,“它的建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地区带来了无限商机”。尤为重要的是,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及其胜利贯通使部分美国人意识到了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对铁路华工极为感兴趣的记者丹尼尔·克利夫兰(Daniel Cleveland)就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国之间休戚相关,感情进一步提升……亚洲和美洲大陆各自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修筑这条足以震惊世界的铁路再合适不过了,愿这条铁路使两国不仅在商贸和利益方面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且感情也得得以升华,两国的影响力能够进一步提升。”可见,自19世纪以来,美国人就意识到了中美之于对方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合作共赢的可能性。太平洋铁路就如同一条跨越大洋的纽带,将东方和西方、将亚洲和美洲、将中国和美国凝结成了一个发展的共同体。

《沉默的钢钉》一书旨在打破铁路华工在美国历史中的沉默,作为一部全面梳理美国铁路华工史的学术著作,该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全球的视角审视了铁路华工鲜为人知的历史,用生动的叙述还原了铁路华工鲜活的生活场景。全球视角的介入不仅提升了贯穿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和为其落成作出巨大贡献的铁路华工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